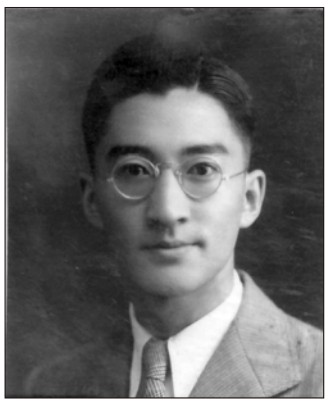
清华岁月

○秦宝雄（1936－1938物理）



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秦宝雄学长

1930年，我家从我的出生地北京搬到南京，我就在当地的金陵中学读了六年书。1936年夏天我考入北京清华大学，9月5日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园报到，在那里读了9个月的书。1937年6月我放假回南京。不到一个月就是7月7日，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战事，在月底占领了北京，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战事，这就是长达八年艰苦抗战的开始。

又过了不到一个月，战事蔓延，我在9月初离开南京，乘轮船去汉口住了一个月。那年10月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与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成了“临时大学”，收容了三校原来在北京和天津的教授、职员和学生。我10月中旬就到长沙学校去报到，住在19标兵营里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读了三个月的书。1938年2月，学校宣布要搬去云南昆明，改名叫“西南联大”。教授、职员和男学生可以步行去昆明，不愿或不能步行的（包括所有女生）可以从香港乘船去法属安南（即越南），再坐火车去昆明。

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待了四个月，觉得所学无几，又恐怕去了昆明，读书环境会更加退化，所以就乘火车到汉口与我父亲（秦汾1887-1973）商量，想去美国继续学习，他稍加考虑就同意了。我就在1938年3月初从汉口飞到香港，再乘船去上海，准备到美国读书，我在清华大学17个月的生活也就告一终结。今天回想七十几年前，在北京清华和长沙临时大学所见所闻，犹历历在目。现在将记得的个人经验，写在纸上，或可帮助今天对上世纪30年代大学生活有兴趣的朋友，了解我们那时的情况。

长期准备

首先笔者要说报考清华的准备工作。报考大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是经过长期准备的，在高中二年级，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。第一是去书店把历年著名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买来研究和温习，明了各个大学考试的内容和关键。那个时候考大学，主要针对的是几个重点大学，依次来排行的话，大概是：上海的交通大学，北京的清华大学，杭州的浙江大学，湖北武昌的武汉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，这些都是国立学校。我们认为次一轮的大学是上

海的沪江大学、苏州的东吴大学、北京的燕京大学、南京的金陵大学，等等，这些都是私立的教会学校。为准备考大学，我们除买了各大学历年考试题目自修以外，学理工的还找到了几本英国牛津大学的物理、算学教科书，自己做题温习，以补学校教学的不足。另外，在高中二年级后，1935年的暑假期间，我和几位同学去了上海交大办的暑期学校，上了几个星期的课，补习物理、数学、化学。

为什么考清华

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，很多中学生对一般大学考试的科目和考题都很下功夫研究。我那时不但对学校的考题非常注意，还研究过各大城市会考（全市集中考试）的题目。上海市会考有一年国文的题目是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》。南京市有一年考题是《安内与攘外，孰先孰后？》，前者需要有国学常识，从“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”引申出来做“八股文章”；后者是对学生政治思想的一个考验，应该如何反应，确实要费些脑筋。

秦宝雄学长珍藏的学生时代证件

那时上海交通大学非常注重国文，由国学大师陈柱尊主持中文系。有一年出的考题是：《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》，这是论语中的一句。我哥哥宝同1935年考上了交通大学。但我1936年没有报考交大，因为觉得交大的教学方法，尤其是国文，实在是不合时代，所以我就报考了清华。

上阵应战

1936年夏天，清华在全国几个地方招考学生，大概有北京、上海、汉口、广州等地，我在上海应试。时期是7月底，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。我在考前四天就去了上海，住在八仙桥的青年会三楼一个房间。那时我带了很多书，每天除了下楼吃三顿饭，就坐在房间里翻看带去的书籍材料。考过以后，忽然明白那三天的时间都白费了，因为清华考的是你的智慧,常识和学识，不是教科书里的东西。

那次考试，有几个项目可以选择。只有英语、数学和国文（现在叫语文）是必定要考的。考题的内容，现在都不太记得了，好像历史有一题是：列出我国历史上10个知名人物，要按年代排出。国文考试一部分是改正几个成语用字的错误，如：伸（身）手不凡、开书（卷）有益、折衡（冲）樽俎等。

最使我高兴的是作文题目：《我的衣服》。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时看了题

目，觉得可以发挥的范围很广，可以写一段故事，也可以写我个人的生活经验。我一经思索，就选了后者，用幽默的口气，述出自己（一个十几岁青少年）选择衣服的困难和问题。居然振笔直书，一气写了一千多字，自己认为满意。

秋季入学

到了8月17日，正在北平的金陵中学同班同学邵循恺，给我发来一份电报，说看到当日《北平晨报》，我们两人都已经被清华录取了。他还说我应该在9月1日前去北京，我的父母也非常高兴，给我准备了一些衣物被服和日常用品，我就带了一个条藤箱和一个手提箱，单身去隔别了六年的北京。据说那年全国报考清华的大约有6000人，被录取294人，最低标准是67分。录取学生排名，以考分为序从上至下，笔者是第176名。

1936年的9月，被录取的“莘莘学子”（校歌里的一句），纷纷自远近各方来到北京（那时叫北平）西郊的清华园，开始大学生活。我们那一级被称为“12级”，“春风化雨”（也是校歌里的一句），乐趣无穷。可惜不到一年，全面抗日战争开始，学校南迁，我就没有能再回清华园继续读书。

入境随俗

初去清华园的新生，对一切情况不太熟悉，有时行动不合“规则”。记得在上最初几课时，每次教师进入课堂，总有很多学生起立致敬。这大概是那时各地一般中学的习惯。有一位教国文的李先生竟为这事把学生教训了一场。他说话的大意是：新生到清华来，应该“入境随俗”。在清华教师和学生都是一律平等，教师来上课，学生不必起立致敬，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一课。后来知道，“入境随俗”并不只限于在教室里，在校园里时时都要注意，以下就是一个实例。

开学两个星期以后，一天半夜，墨漆黑里，忽然有几个人冲进我的四院宿舍卧室。他们先用手电筒在我脸上照了一下，就大声地说：“就是找你，赶快下楼！”我糊里糊涂，只好跟他们下楼，看见有一堆人等在宿舍大门外。有一个人跳出来说：“这位新生行为不合‘规则’，应该把他‘拖尸’。”我当时就问他：“有什么越轨行为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有一天你穿了清华网球校队的绒线背心，在各处招摇。你还穿了军官式的制服，在校园走动。”当时不由分说被几个彪形大汉抬手抬脚，在空中摇晃了几下，幸未筋骨受伤。我才记起来，有一晚去找旧识11级林慰梓聊天，临别时因为夜凉，向他借了一件绒线背心（网球队员用的）穿回宿舍；我还曾穿过金陵中学的制服在校园走动。想不到因为“我的衣服”（入学考题）而致祸。后来有人和我说“拖尸”这件事是一些11级（比我们12级高一级）同学搞的。凡是他们看了不顺眼的12级新生，都要被“夜半拖尸”。那夜另一位被拖尸的是王恭斌——著名外交家王正廷（1882-1961）的侄子，北京育英中学毕业。拖尸（英语toss“抛扔”的音译），是美国大学的一个风俗。高班学生要给新学生一个下马威：把他们抛在水里，或用其他方法来捉弄他们。主动把我拖尸的是11级的陈体强， 他的外号叫“陈体亏”。

院长捡球

在校园里一片最旧的平房宿舍里（大概是二院）有一连串三间屋子，每屋都只放了一张乒乓球桌，是专为学生作课余运动之用。我和屋友邵循恺（他50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。以后回国任教，后来死在海南岛）都嗜好打乒乓球，每星期必定要去打两三次。有一个早春星期六的下午，我们打了半个钟头以后，汗流浃背，就把屋后两扇玻璃窗打开通风。不巧一下子用力过猛，把球打出窗外。因为出去捡球要绕走很多的路，所以我们就到窗前去观望，刚好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薄呢大衣的人，靠着屋子旁边走过来。我们就指着落在远远路旁的球说了一声："Ball, please！"那位先生居然跑了好几步，弯腰将球拾起，扔进窗内。我们称谢之余，仔细一看，那捡球的人原来是工学院院长顾毓琇。

教授不交题

第一学期的大一物理，在一间很大的教室上课，有五六十个学生。这课原应由萨本栋教授主讲（他所著的中文《大学物理》就是这课的教科书）。不过因为萨先生在美国没有回来，所以最初的几个月，由吴有训教授代课。那时每星期照例有几个物理题目，学生要在星期一上课以前，将写好的解答，放在教室前的一张长方桌上。大约在新年以后的一个星期一，我在上课前几分钟去教室前讲台交题。看见有一个穿着蓝色长袍的年轻人站在桌旁。我虽然不认识他，但看见他很年轻，以为他一定是同班同学，就顺便问他一句："你交题了吗？"他向我摇了摇头，微笑着说："我不用交题，我是萨本栋。"我就去和他握手，欢迎他回来教课。

我认识的两个教授

1936年，去清华以前，父亲给我一封信，叫我到清华后去找数学教授郑桐荪（1887-1963），因为父亲和郑在民国初年，一度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教过数学。我去拜望郑教授和夫人后不久，他们就请我吃饭，同桌还有八九个学生，好像都是那年考取的新生。

一年以后，我在长沙临时大学选了郑桐荪的微积分课。只上了两三次，就有日本飞机轰炸市区和车站。以后他就没有再来上课，听说他和女儿回北京去了。

还有一个我认识的教授是潘光旦（1899-1967）。开学不久，他叫人来找我，说要请我到他家吃晚饭。我按时前去，才知道那是一个同乡聚会。江苏省邻近上海的四个县，太仓、嘉定、崇明、宝山的人都算是同乡。潘光旦是宝山人，我原籍是江苏嘉定，所以被请，其他六七个在座学生也都是真正的同乡人，或因祖籍而算是同乡人。说说笑笑，倒也很热闹。

声震清华园

1937年的春天，同级的张宗颖和我说："不久就要开全校运动大会了，体育部正在找一个报告员，我看你嗓门大，我可以介绍你去做这件事。"我答应了以后，果然就在几天内收到一份聘书，说明开会日期、时间和工作项目。全校运动会在一个周末的星期六和星期日，开了两整天。我做报告员的任务是用一个很大的喇

叭式扬声筒宣布开会、闭会，报告各项节目开始的时间、地点和比赛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我就是人力发音的电子扩音机。那个周末正好天气煦和，一际无云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燕京也有不少同学来参观,非常热闹。我虽大叫了两天，并没有力竭声嘶。以后张宗颖常和我开玩笑，说我是“声震清华园”的人。

纪念校庆

1937年 4月24（23）日，清华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校庆纪念。那时候一切都很简单朴素，不像2011年百年校庆那样的举国同庆。1937年清华的26周年校庆，只是在晚上有京戏节目。早晨在大礼堂开了个纪念会，由校长梅贻琦主持，请了两个人来讲话，一个是胡适，一个是颜惠庆。

会后我走上前去和胡适（1891-1962）握手，他说还记得一年以前在南京来我家吃午饭时见过面。以后40年代，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，在各地演讲，也来到我就读的普渡大学毕业典礼讲话，所以我又有机会和他见面。

另一个讲话的颜惠庆（1877-1950），是中国资深外交家，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，及代理国务总理等职。颜当时刚从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任上辞职回国。他一口上海官话，那天讲的是在宣统二年，也就是1910年，他负责筹办清华学堂，常常从北京骑小毛驴到清华园办事。
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颜惠庆，也是最后一次。1939-1940年，他在美国给国民政府办外交，我在美国读书，他是高官，我是学生，当然无缘再和他见面。想不到在九年以后，也就是1946年，10月17日，我在美国和他的三女儿颜彬生（1921生于北京）结婚。以后我们在美国各自努力做自己的工作，假期去世界各地游历，共同度过了56年和谐安详的日子。2002年9月3日，她因脑溢血去世。一年以后，我和我们多年旧友金芸培女士结婚，她是音乐教授，钢琴老师，善于烹饪，家务井然。我的生活也又平定下来。

长沙临时大学的制服

1937年秋天，临时大学在长沙开课，每个男同学都领到一件黑布棉大衣，也可以算是“制服”吧。那时我们都住在四十九标军营，接受军事管理。每天早晨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一听起床号响，大家在五分钟内必须跑出去，穿好黑布棉大衣，在广场上排队点名。我每晚在睡觉以前，就把所有的上衣，包括衬衫、毛线衣、黑布棉大衣（都是胸前有纽扣的）都套在一起。晚上把这一套衣服，盖在棉被上取暖。早晨起身，就把这一套衣服，加速穿上。因为没有时间去扣所有的纽扣，只把外面棉大衣的几个纽扣扣好，就可以在晓风残月下，排队“应卯”了。

长沙读书困难

临时大学在长沙的教学设备，等于内地较好的中学，当然和北京清华要差好一大截。实验室没有，课堂常常找不着，教科书很难买到，听课和自修也都成问题。我上了三个月的课，觉得没有学到什么东西，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。1938年2月，学校宣布即将搬去云南昆明。我恐怕读书环境会更加不行，就乘火车到汉口和父亲商量去美国念书。他同意了，我就在3

月从汉口飞香港，再乘船到上海，准备出国。

最后出国

到上海后，我就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母亲租的公寓里，没有去上学，只在家里自修，问题是：自修什么？父亲写信来说：“为将来在中国做事，你现在应该学好国文。”他的意思是我应该乘还有机会，念些中国经典古书。我的想法和他不一样，我觉得要去美国，应该学习在美国立刻有用的科目，所以就找了补习学校去学英语对话和打字。在美国读书时，上海“临时抱佛脚”所学的两样本事，确实给我很大的帮助。可是现在古文写不好，也是那时决策的后果。

我一边学习，一边一步一步往前走：在上海领了护照，得了美国普渡大学（Purdue University, West Lafayette, Indiana ） 转学准许，去美国领事馆办了签证，买了几套西装，定好了船票。1938年8月22日，与母亲和家人告别，在黄浦江码头登上渡轮，转去停在长江口的加拿大皇后号轮船（S. S. Empress of Canada），乘长风破万里浪，经日本，过夏威夷，奔去北美洲。

在烟台大学的日子里

〇谢树煜（1959计算机）

1984年春节，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视察烟台。市委书记王济夫不失时机地提出地方集资办大学，寻求中央支持的愿望，得到万里同志的支持。中央决定建立烟台教育改革实验区，支持开办烟台大学，担当“提高国民素质，多出人才，快出人才”的重任，为开放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。

1984年5月底，全国人大召开前夕，万里副总理召集教育部长何东昌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（原教育部党组书记、副部长）张承先，山东省长梁步庭，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开会。决定请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支援烟台大学建设，请张承先担任烟台大学名誉校长，指导落实有关建校工作。

谢树煜2009年于烟台大学海滨

1984年6月，决定北大副校长沈克琦出任烟台大学校长，清华热能系党委书记杜建寰任烟台大学党委书记、副校长，主持常务。决定北大清华抽调骨干教师担任烟台大学各系系主任。